

## 宣教應用

---

### 有效的城市宣教

葉大銘牧師

(加拿大多倫多北約恩典福音堂主任)

按最近的調查，中國的人口已接近一半居住於城市，數年後大部份人口將居住於城市。中國教會以前在鄉村增長極快，但隨著大量人口遷移至城市，鄉村教會遇到嚴重的信徒流失。今後若不能有效的在城市宣教，前途不可樂觀。筆者多年在城市事奉，並在亞洲教授城市宣教。本文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探討有效的城市宣教，提出一些實際建議和可能遇到的挑戰<sup>[1]</sup>。

#### 「城市」的特質

城市的定義是什麼？城市和鄉村有什麼分別？在中國城市被分為直轄、縣級、和地級城市，另外又按着居住人數分為大、中、小型城市。這些名詞和分類的出發點是以城市為地方，但對城市宣教更重要的是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城市，找出城市的特徵。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的宣教。以下說明城市的重要特徵。

#### 1. 現代化、部門化、和世俗化

人類學者列羅伯(Redfield)提出從部落村莊至城市的城鄉連續體觀念(folk-urban continuum)<sup>[2]</sup>。這觀念列出以下的對比：

##### 部落社會(tribal society)

傳統性

同質性

##### 城市(urban society)

流動性

異質性

集體性	個體性
先賦地位	既得地位
少變化	急促變化
整全的生活	分裂的生活
神聖宇宙	世俗化宇宙

這觀念後來被學者批評為過份簡化，而且不是形容城鄉的分別，而是形容傳統社會和現代化世俗社會的分別。這些批判都是合理的，但是列羅伯的觀念仍有可取之處，特別是比較現代的城市和傳統部落社會。現今的城市都是現代化，因此我們可以稍為改變這觀念來顯明現代城市和部落並鄉民(peasant society)的分別。

---

<b>部落</b>	<b>鄉民</b>	<b>現代城市</b>
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這個連續體顯示鄉民社會(即是中國的農村)是介乎部落社會和現代城市之間。每個農村都是不同的，有些接近部落社會，有些接近現代城市。對城市宣教重要的，不是在社會被稱為「農村」和「城市」的地方，而是從人類學來看那個社會的城市化(顯現城市的特徵)程度。具體的來看，現代城市和部落社會的一個主要分別是從整全的社會(holistic society)轉變為現代化社會。

在每個社會中都有基本的社會制度存在，例如經濟、政治、社會、和宗教的制度。在整全的社會中，這些基本的社會制度互相關連，有高度整合性，並且社會的功能平均分配於這些基本的制度。例如宗教的制度和經濟政治有緊密關係，並且被社會重視。在開始農耕或狩獵時會舉行宗教儀式，所有大節日都有濃厚的宗教色彩，很多部落的領袖也是宗教領導人。

在現代化社會中，這些基本的制度失去緊密關係，各自運作，導至社會生活形成部門化(compartmentalization)，生活分裂。宗教對其他制度失去影響力，就形成世俗化(secularization)的現象。在社會學中世俗化的意思不是接受世界(俗世)的價值觀的影響，

而是指信仰行為在公眾場合失去影響力，而轉為私人生活的表現。而且表現局限於宗教場合，其他場合如職場、政治、家族等場合和信仰失去關連。在社會中宗教不再重要<sup>[3]</sup>。

部門化和世俗化帶來其他的轉變。一個轉變是政治現代化，政治體制不再像部落社會需要宗教賦與合法化，而是靠意識形態和政黨成為合法。第二個轉變是社會現代化，工商業企業出現。為了培育企業員工，教育制度變為很重要。藉着教育和工作人民的社會階層流動性轉大，可以從貧窮變為富有，從低層變為上層人士，因此人民的效忠對象從家族和民族轉為企業、機構和階級。第三個轉變是心理現代化。人的心態轉為將來取向，做事要有目標策略，現在辛苦是為了將來成功。此外，深信人能勝天，改造環境來製造美好將來<sup>[4]</sup>。這心態也形成社會制度的合理化(rationalization)，工商業管理學成為社會的治理方法。

這個現代化情形最明顯出現於現代城市。下圖表示這個情形<sup>[5]</sup>：

	整全	部門化	世俗化
部落	是	不是	不是
鄉民	不是	是	不是
城市	不是	是	是

現代化、部門化、和世俗化是現代城市的特徵。在美國這情況已蔓延至所有鄉鎮，可以說全國已城市化。在中國有些農村也開始城市化，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<sup>[6]</sup>。

## 2. 異質性(heterogeneity)

芝加哥派社會學家維路易(Wirth) 為城市定下經典的定義：城市是一個比較大、密集、和長久的社會上異質性的個體的定居<sup>[7]</sup>。因為人口多和密集，在城市中可以找到不同性質的人。城市吸引不同的人從外地遷徙而來，包括鄉民和不同種族，所以城市的人口是多元化。因為在城市親屬關係變弱，人群會按不同標準相聚交流，例如種族、經濟、社會地位等。另外隨着人口的經常流動，人際關係變為稀薄，市民減少對任何團體的忠心，而會參與和組織不同的團體。因此城市有異質性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。在城市裡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組織、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。

### 3. 個性失落(depersionalization)

因為異質性、人際關係的稀薄、和薄弱的社會約束力，人們的交往成為形式化，缺乏深入分享和彼此認識，對待別人像陌生人一樣。在城市中很容易看到你爭我搶，見到別人有需要也不理會幫助。這就是人際關係的個性失落<sup>[8]</sup>。

有些社會學者指出因為城市吸引很多外來群體，這些群體來到同一城市，會繼續保留他們的緊密交往，所以不會產生個性失落<sup>[9]</sup>。雖然在同一群體中不會發生，但是遇到不同群體，個性失落仍會發生，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。

### 4. 傳統親屬關係被核心家庭取代

在城市中親屬們各有不同工作，不像在鄉村彼此照顧。各人為謀生培養自己才能，建立工作上的交際圈子，因此減少依賴親屬。另外生活繁忙，住居窄小，不適宜擴大家庭。因此親屬的交往轉少，傳統的親屬關係變為稀薄，相對上核心家庭興起<sup>[10]</sup>。在中國親屬關係仍然重要，但其影響力已大不如前<sup>[11]</sup>。

### 5. 從親屬至社群和交際網

因為親屬關係變為稀薄，在城市中社群成為滿足市民社交需要的組織。社群不是親屬的組織。主要的社群是自願社群，包括從鄉村遷移至城市的村民所結成的互助社群。在中國民工仍然保持和鄉村的緊密關係，同鄉、同縣、或同省的民工會互相交往幫助。另外有按着職業、娛樂、慈善、社交等目的而成立社群。在大城市中也可能有不同少數民族，他們會組成族群社群，這些是地域性社群<sup>[12]</sup>。

在大城市中經常出現交際網，在社會關係上有很重要角色。交際網是不屬於有組織的群體的社會關係。市民向鄰居詢問如何購買物件，孕婦們交換生產心得，邀請朋友吃飯等活動，這些都是交際網的活動。中產階級依賴交際網來彼此聯繫，在現今高科技社會中，可以藉互聯網形成全國性甚至全球性交際網。窮人也藉交際網互相幫助，解決日常生活的困難<sup>[13]</sup>。

交際網可以聯繫不同階級的人，但通常是同一階級、同一背景、或同一嗜好的人。

交際網可以聯繫深交朋友和淺交朋友。深交朋友都是彼此認識的，不會有太多個。在淺交朋友中很多都不是彼此認識。但每個淺交朋友有另外的淺交朋友，因此淺交朋友可以將很多人聯繫起來。沒有很多淺交朋友的人容易和大社會隔離，形成狹窄的眼光，和在缺乏朋友傳遞資訊下處於不利的情況。資訊是藉淺交朋友而廣傳，但藉深交朋友的影響力才容易帶來轉變。

交際網所聯繫的人有不同角色，包括影響者和仲介人。仲介人是藉着和不同社群的關係，從一社群支取資源來幫助另一社團。交際網的強弱和資源的供應會影響仲介人的重要性。

## 6. 階級觀念的增強和多層化

城市是一個權力集中的地方，而且人多社會複雜，工作分門別類，所以形成多層階級觀念，並且這觀念比鄉村強很多。在職場、工廠、政府、甚至教會中等級制普遍存在，影響人的交往，也鞏固有權勢者的地位<sup>[14]</sup>。

## 7. 心理過荷(psychological overload)

城市的生活節奏快速，壓力強，競爭大，所以市民的心理負擔容易過荷。市民會採取不同方法來處理這問題。首先是減少用於處理問題的時間和資源。第二是定下優先次序，故意不理會不重要的問題。第三是阻止有些資訊的傳遞，例如社交網上用密碼。第四是表面化的與人交往，沒有深交便不用面對問題。第五是設立制度來隔濾資訊。這些方法造成以下現象：

不理會陌生人的危機，例如在街上見到別人跌傷

不信任甚至害怕陌生人

在公眾場所沒有禮貌秩序，例如爭搶上公車<sup>[15]</sup>。

## 8. 匿名化(anonymity)

城市居民可以隱藏在大群眾中，不為人所知，對別人沒有什麼義務責任，也不需遵守禮貌規矩<sup>[16]</sup>。匿名化可以造成寂寞和身份的迷失，但亦會帶來自由。在集體主義的文

化下，個體平常受很大的社會壓力來附從群眾，造成羊群心態。城市的匿名化給個體一個機會，表現不同的自我，和嘗試另類的行為<sup>[17]</sup>。

## 9. 個人主義

匿名化可以幫助個體表達自己風格，在社會約束力減少下可以追求自己的嗜好夢想。這樣就形成以個體為中心的價值觀，也就是個人主義的抬頭<sup>[18]</sup>。有些社會比較上着重集體主義，但在這些社會的大城市中，不難看到個人主義的影響，中國的大城市就是一個例子。

## 城市宣教的處境化

### 1. 信息的處境化

城市人生活於稀薄的關係、與人疏離、個性失落、和沉重壓力的情形下，他們追求安全感、歸屬感、真我、和心靈的安息。在馬太福音 11 章 20 至 30 節，主耶穌經過哥拉汛、伯賽大、和迦百農幾個城市，這些城市藉着大道連結為較大的都會。在這樣處境下，主耶穌說：

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、可以到我這裡來、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裡柔和謙卑、你們當負我的軛、學我的樣式、這樣、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。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、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」(太十一 28-30)

這個安息的信息正是城市人最需要的<sup>[19]</sup>。

除了言語的宣教外，實際行為也是必須的。教會有溫暖，弟兄姊妹有和睦親密相交，才會吸引未信者來信主。

### 2. 有效的接觸對象

因為城市的親屬關係變弱，所以不應單藉親屬關係來發展宣教，也要藉着社群和交際網。上文已指出資訊是藉淺交朋友而廣傳，但藉深交朋友的影响力才容易帶來轉變。所以城市傳道人要利用交際網來盡量認識人。即是認識甲後，要繼續認識甲的朋友，這樣就可以認識很多人，傳福音給很多人。但是要有效的帶來生命轉變，就要建立深交。當然一個傳道人不可能和很多人深交，因此培訓信徒來佈道和門徒訓練是必須的。

## 城市宣教的挑戰

城市宣教要面對幾樣重要的挑戰：

### 1. 世俗化和部門化的信仰

世俗化和部門化是現代化城市的特徵，這兩方面明顯的對城市宣教有重大影響，帶來重大挑戰。在這樣的社會中，宗教信仰成為個人私底下的信仰，和生活其他方面隔離，也和公眾生活脫離關連。城市宣教要面對的挑戰，就是如何幫助信徒過一個整全的基督徒生活，不單在教會，也在家庭、職場、社會等各方面活出信仰。

中國自從經濟開放後，物質和財富是各人追求的對象，城市化更突出這個現象。城市的基督徒要不斷的面對這個挑戰。有很多令人振奮和欣賞的成功例子，但很可惜亦有失敗的例子，溫州教會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在溫州可以找到愛主的基督徒企業家整合信仰於事業，他們開廠以聖經原則來營業，在廠內向工友佈道，而且以這模式向外地宣教。但是亦有壞例子，基督徒企業家變為奸商，甚至因此身下囹圄<sup>[20]</sup>。

面對這些挑戰，劉同蘇提出中國教會要從「紅色殉道」轉為「白色殉道」。紅色殉道是指流血的、身體受折磨的殉道，這是過往家庭教會的經歷。現在這些情形已比較上減少，但是教會信徒仍需有殉道的心志，就是白色殉道的心志。白色代表聖潔，為了保持聖經的道德標準而願意在生活上犧牲利益<sup>[21]</sup>。這是城市宣教要面對的挑戰。

### 2. 階級隔離和衝突

在城市中有權和無權、富者和窮人、高階級和低階級的差距比較大，很容易造成群體的隔離和衝突。有人列出中國十大階層，在城市中明顯出現：(依等級的高低次序) 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、經理階層、私營企業主階層、專業技術人員階層、辦事人員階層、個體工商戶階層、商業服務人員階層、產業工人階層、農業勞動者階層(在城郊)、無業、失業和半失業階層<sup>[22]</sup>。這些階層的分別不但造成群體的隔離，而且因為利益而很容易引發衝突，像民工和企業主的衝突。城市宣教要面對這個群體與階級隔離和衝突的挑戰。有兩個特別的挑戰，一個是和教會增長論有關。在教會增長論中有「同質單位原則」(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)，即是最有效的植堂策略是在每個群體中植堂。但這策略會加

強群體與階級隔離，這樣與教會合一的聖經原則有矛盾嗎？另外一個挑戰是群體與階級中發生衝突時，基督徒應怎樣處理？當民工和基督徒企業主或經理發生衝突時，基督徒民工和企業主應怎樣處理？當在城市中不同民族發生衝突時，基督徒應怎樣處理？這些挑戰是城市教會要面對的。

### 3. 合理化的管理

現代城市帶來的社會制度合理化，使工商業管理學成為社會的治理方法。這影響延至教會，教會作為一個組織，也不免使用工商業管理學來治理。以前中國家庭教會主要是農村教會，用傳統文化的家長制來治理。現在城市教會的興起，中國教會不能避免轉型，若不使用工商業管理學來治理，便會產生很大內部困難<sup>23</sup>。當然中國教會所需要的，不是西方的工商業管理學，而是中國式的工商業管理學。

另一方面社會制度合理化也帶來危機。一個是依賴人的計劃多於依賴神。另一個是以西方社會制度合理化帶來的文明發達和繁榮，來証實基督教信仰和資本主義的優越性。韋伯提出西方新教倫理(Protestant ethic)帶來合理化和資本主義。他的名著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」是溫州很多基督徒企業家熱衷愛讀的書本，他們用這理論來証實基督教信仰和資本主義的優越性，並藉此鼓勵員工勤奮工作<sup>[24]</sup>。但是韋伯的理論受很多學者質疑，批評之處包括他對新教徒(特別是加爾文主義和清教徒)的偏重，對天主教的誤解，對西方資本主義源起的認識的錯誤，和缺乏證據等<sup>[25]</sup>。所以中國城市教會不應將信仰建立於這些理念上，也不要過份崇尚合理化和資本主義。

### 4. 人口流動性

城市的人口流動性很大，不單是很多鄉村村民移居至城市，而且市民也不斷移居，從城市一區搬至另一區，或搬至另一城市。這給城市宣教帶來很大挑戰。一方面是如何有效的向這些龐大的移入群體宣教，另一方面是如何處理信徒移出的問題。教會需要擬定一套有效的事工模式，可以在短時期內教導指領新信徒札穩根基成長。

### 5. 貧窮和不公義



城市越大，貧富差距越大，窮人的數目也越多。因為權力的差距，財富利益的誘惑，不公義現象會越彰顯。這些在中國城市很容易見到。城市宣教不可以忽視這些問題。

## 總結

本文簡單的論述現代城市的特徵，從而應用到中國城市宣教，指出在中國有效的城市宣教方法，並會面對的主要挑戰。筆者希望藉此幫助中國教會更有效的作城市宣教。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 29 期，2012 年 7 月。

(謝謝作者供稿！)

---

<sup>1</sup> 人類學對城市的研究起源於社會學，特別是一九二零年代的美國芝加哥社會學派，學者如巴羅伯(Park)和維路易(Wirth)探討城市的性質。到四零年代人類學者列羅伯(Redfield)提出城市、鄉民和部落的分別。現代城市人類學者的研究從多元化角度出發，包括城市生態學、交際網分析、城市設計、政治經濟、和符號研究。參考 Seta M. Low ed., *Theorizing the City: The New Anthropology Reader* (New Jersey: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, 2002), 2-5.

<sup>2</sup> Robert Redfield, *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0).

<sup>3</sup> David Filbeck, *Social Context and Proclamation: A Socio-cognitive Study in Proclaiming the Gospel Cross-culturally* (Pasadena, CA: William Carey Library, 1985), 33-34.

<sup>4</sup> Donald Light Jr., Suzanne Keller, *Sociology* (New York: Alfred A. Kopf, 1975).

<sup>5</sup> David Filbeck, *Social Context and Proclamation: A Socio-cognitive Study in Proclaiming the Gospel Cross-culturally* (Pasadena, CA: William Carey Library, 1985), 87.

<sup>6</sup> 在發達國家後現代城市已出現，參考 Seta M. Low ed., *Theorizing the City: The New Anthropology Reader* (New Jersey: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, 2002), 16-18。但在中國後現代主義對城市化的影響很微，而且後現代主義承接現代化的部門化和世俗化。

<sup>7</sup> Louis Wirth,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, in *Urban Life*, ed. George Gmelch, and Walter P. Zenner (Long Grove, IL: Waveland Press, 2002), 70.

<sup>8</sup> 同上 76.

---

<sup>9</sup> Oscar Lewis, Urbanization without breakdown, *Scientific Monthly*, 75 (1952):31-41; Janet Abu-Lughod, Migrant adjustment to city life: The Egyptian case, *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*, 47(1962):22-32.

<sup>10</sup> Louis Wirth,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, in *Urban Life*, ed. George Gmelch, and Walter P. Zenner (Long Grove, IL: Waveland Press, 2002), 79.

<sup>11</sup> William Jankowiak, Urban Chinese: family life in a communist society, in *Urban Life*, ed. George Gmelch, and Walter P. Zenner (Long Grove, IL: Waveland Press, 2002), 323-330.

<sup>12</sup> Paul G. Hiebert and Eloise Hiebert Meneses, *Incarnational Ministry: Planting Churches in Band, Tribal, Peasant, and Urban Societies*, (Grand Rapids, MI: Baker, 1995), 279-287.

<sup>13</sup> 同上, 278.

<sup>14</sup> 同上, 272-273.

<sup>15</sup> Stanley Milgram, The urban experience: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, in *Urban Life*, ed. George Gmelch, and Walter P. Zenner (Long Grove, IL: Waveland Press, 2002), 84-89.

<sup>16</sup> 同上 89-90.

<sup>17</sup> 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。有關東京市民如何藉無匿名化來嘗試另類行為，參考 Gary Fujino, “Glocal” Japanese self-identity: A miss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paradigmatic shifts in urban Tokyo,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logy* 27:4 Winter (2010), 171-182.

<sup>18</sup> Paul G. Hiebert and Eloise Hiebert Meneses, *Incarnational Ministry: Planting Churches in Band, Tribal, Peasant, and Urban Societies*, (Grand Rapids, MI: Baker, 1995), 317-319.

<sup>19</sup> David Filbeck, *Social Context and Proclamation: A Socio-cognitive Study in Proclaiming the Gospel Cross-culturally* (Pasadena, CA: William Carey Library, 1985), 145-149.

<sup>20</sup> 有關研究溫州教會的民族志參考 Nanlai Cao, *Constructing China's Jerusalem: Christians, Power,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* (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).

<sup>21</sup> 劉同蘇，中國家庭教會當下面臨的六大內外挑戰， *Chinese Christian News* 2011.1.8.12.

<sup>22</sup> 資料來自中國社科院課題組。明報新聞網 2011.2.14.

<sup>23</sup> Nanlai Cao, *Constructing China's Jerusalem: Christians, Power,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* (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) 書中記述一些治理問題。

<sup>24</sup> Nanlai Cao, *Constructing China's Jerusalem: Christians, Power,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* (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), 33-35, 75, 165.

---

<sup>25</sup> Anthony Giddens, Introduction in Max Weber, *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*,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(London: Urwin, 1985); Henryk Grossman, The Beginnings of Capitalism and the New Mass Morality, *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* 6.2 (2006 July); David Cantoni,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: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,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per, (November 2009).

約 6,210 字

### 筆者簡介

葉大銘 George Yip

北約恩典福音堂主任牧師 (Toronto, Canada)

前海外基督使團 (OMF) 日本宣教士

現在經常於亞洲和非洲培訓亞洲和非洲宣教士

D.Miss. (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)

地址: 201 Tempo Avenue

Toronto, ON

Canada M2H 2R9

電郵: [gtaiyip@yahoo.ca](mailto:gtaiyip@yahoo.ca)